

一九二二年上海罢工运动的兴起(下)

陈 卫 民

三、上海海员大罢工的胜利,工人领袖林伟民

八月,上海海员大罢工是打得很出色的一仗,领导这次斗争的是工人领袖林伟民。

当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发生大罢工时,上海海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组织了香港海员后援会,给予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有力的支援。但是,上海海员未能乘势而起,同时罢工,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上海海员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

上海海员团体五花八门,其中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叫“焱盈社”,是火夫的组织,有六千人,广东人居多,穆生甫为领导人;另一个叫“均安公所”,是水手组织,共四千人,宁波人居多,钱孝裕为领导人。此外还有领港公会、炳记社、联义社、广义和、善政公司、定海公所、兴业社等二十四个团体。且有宁波帮、广东帮、天津帮、汉口帮、烟台牛庄帮之分^①,彼此互不相关,甚至对立。为了增强海员的团结,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和董锄平曾经在海员中开展过“天下工人是一家”的团结教育工作^②。并号召“本埠海员亦组织一中华海员工会”^③。但是,最终完成上海海员工会组织工作的是林伟民。

林伟民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因病逝世。他于一八八七年农历九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劳动。十九岁,他离开家乡到香港,在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开始了苦难的海员生涯。悲惨的生活现实,严酷的民族歧视,日渐激起了林伟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和反抗。一九二一年三月,林伟民和苏兆征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简称香港海员工会),他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一九二二年一月又和苏兆征一起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林伟民、苏兆征等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了大会,向代表们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及斗争经验^④。上海均安水手公所活动分子朱宝庭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等也出席这次会议。会上,李启汉、朱宝庭与林伟民、苏兆征相认识,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朱宝庭从香港海员工人的胜利斗争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他代表上海海员邀请香港海员工会派人到上海协助建立统一的海员工

① 《民国日报》,1922.8.7。

② 《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82—83页。

③ 《民国日报》,1922.2.9。

④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102页。

会组织。会后,林伟民受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派,与李启汉、朱宝庭一起到上海,林伟民即着手筹建海员工会。他与朱宝庭等,不断深入到各条轮船中去,与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一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上海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团结一致,为着海员工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经过近二个月的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入会会员已甚踊跃,非仅本埠各海员甚为赞成,即其余各种团体,亦愿予以赞助。”^①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上海海员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简称上海海员工会)正式成立,会员达二千七百人,林伟民任会长。

上海海员工会成立后,林伟民立即组织发动了上海海员的罢工。由于外商轮船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工资,这次斗争的锋芒主要针对招商局,兼及其他华人中小轮船公司。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拥有轮船三十艘,海员约一千五百人^②,在航业界居领袖地位,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

林伟民运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经验,由海员工会代表全体海员连续发信三封给招商局和中小轮船公司。七月二十三日,发第一封信,要求援引香港海员和船东达成的加资协议,从一月一日起增加工资。招商局置之不理。二十八日发第二封信,招商局不接受,把信拆开后退回。八月三日又发第三封信,除了重申加资要求,并向他们发出“否则船工设有意外举动发生,敝会实难负责”^③的警告。招商局有恃无恐,不予理睬。上海海员遂于八月五日上午八时进行罢工。首先罢工的新江天、新康、升平、甬兴等十三艘轮船,六百名海员,其中招商局有九艘。^④船员纷纷登岸,到上海海员工会签名,表达他们自愿罢工的决心。以后罢工船只陆续增加,凡轮船开进上海港,随即加入罢工的行列。总计先后停船大小三十七艘,一千五百多名海员参加罢工。^⑤

海员发表了罢工宣言,理直气壮地说:“处今日新潮澎湃的时代,工人觉悟,无复俯首贴耳抵压于资本制度之下了!”指出“我同业的兄弟,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百端的辛楚,比别的工人,更有甚焉!”号召海员“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⑥

海员工会在外滩十六铺中华茶楼设立了招待处,作为罢工的联络中心和指挥部。海员上岸后,招待处把他们安排在水手公所、森盈社等海员团体内住宿,上海有家室的听其便,每天津贴膳费大洋三角。罢工的每艘船上派两名船员值班,防止破坏。黄浦江中放舢板两只,上插海员工会的旗号,在江中往来巡弋,维持秩序。处处显示出工会办事的魄力和气派。

中小轮船公司船舶少,资本小,经不起罢工的损失,有的还想乘机捞一票。因此,他们违背招商局的意旨,罢工第二天起,就纷纷派代表找海员工会商谈,有的公司船只航行在外,还未参加罢工,也都迫不及待地要求签订加资协议。海员工会提了五项条件:(一)内河船和一千吨以下轮船加三成,沿海轮加二成。(二)加资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算起。(三)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四)复职后公司不得任意开除海员,倘有不合,须函知本会得双方允许方可。(五)与船员签字时,须本会派有正式代表监视签字,方为有效。对第二条,中小公司认为,海员要求加资的第一封信七月二十三日才发出,加资不应从一月一日算起,对第四条也提出了不

① 《民国日报》,1922.6.29。

② 1922年8月3日《民国日报》。根据记载,二十四艘轮船人数总和是1134人,还有六艘人数不详,平均以五十人计,三十艘船,总计人数约为一千五百人。

③ 《民国日报》,1922.8.4。

④ 《民国日报》,1922.8.6。

⑤ 根据1922年8月5日至26日《民国日报》记载材料统计。每船配有几名海员都有具体记载。这与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24页记载的“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的数字接近。

⑥ 《民国日报》,1922.8.6。

同意见。为了分化各轮船公司的团结,集中力量对付顽固的招商局,林伟民当机立断,作了必要的妥协,答应加资从七月二十三日算起;将第四条也修改为复职船员如有非法行为,经船公司查明,立即开除,惟有冤诬等情,经海员工会调查属实,有权向该公司交涉,得复原职,并补回原有工金。协议很快达成。凡达成协议的公司第二天即开航。开船之日,码头举行了热烈的欢送海员复职仪式,“海员万岁!”的口号响彻浦江两岸。

罢工第四天,即有宁绍、元一、肇兴、政记、平阳、裕丰、同裕、绍兴等八家公司签订了加资协议。起初三北公司听命于招商局,取观望态度,犹豫再三,至十四日,感到追随招商局没有出路,也只好与海员工会签字。至此,上海十八家轮船公司(其中一家是木行)中^①,只有招商局还在孤军顽抗。招商局拍电报到各码头,通知所属未启程的轮船不要开往上海,以防加入罢工;派遣走狗、工贼分头到海员中去活动,煽动他们不要服从海员工会的号令;用重金收买失业海员去上工,竭力挑拨广东与上海两帮海员之间的关系,分裂罢工队伍。更为卑鄙的是雇佣流氓打手暗害罢工领导人,有一个晚上,朱宝庭开会回来,半路上便遭流氓打手打伤,昏倒在地^②。种种破坏均未见效。接着,又要了一个花招。八月十四日上午,由各船主出面,写信给各船的水手、火夫、管事等头目,约他们下午至招商局磋商一切,企图分化海员与工会的关系。各头目即赴海员工会报告。林伟民马上召集他们开会,其中的问答是非常动人的。林问:“招商局既由船主致函诸君,不知诸君果愿往否?”众起立齐答:“此番香港海员要求加薪,完全托付海员工会,此后凡所接洽,当然由海员工会出面,决无由我等私自接洽之理。”林问:“假如招商局方面与君等自行接洽,愿意加薪,则君等将如何主张?”众答:“此必无之事,即使有之,我等凭良心主张,断不敢以私而妨公,致负海员工会匡助之苦心。”最后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凡来信约私人接洽,一概不予理会,如果有所磋商,非由招商局派代表到海员工会面洽不可。表现了海员高度的觉悟及组织纪律性。

招商局还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来破坏罢工。海员工会在十六铺中华楼设立招待所,招商局即用电话报告淞沪警察厅,要求派警取缔。警厅立即派警前往,看到罢工很有秩序,找不到镇压的借口,只将贴在该楼的各种通告及海员工会招待所的字样撕去。招商局又通过军阀政府交通部,指使外交特派交涉员,于八月十五日、二十三日连续二次写信给帝国主义领事团,乞求他们协助镇压海员罢工,封闭设在公共租界百老汇路一百六十三号的上海海员工会。帝国主义对上海海员罢工同样持仇视态度,他们不断派侦探监视海员工会的活动,指使邮政局扣留上海海员工会寄往香港海员总会的邮件。但是,帝国主义在香港海员罢工中已弄得狼狈不堪,前车之鉴使他们不敢轻视上海海员罢工的力量。正如工部局总办栗代尔写给各董事传阅的公文中说:“当罢工工人在目前所采取的完全是和平的策略,并且看来他们并非为中国海员工会所强制,而相反是全心拥护罢工的,工部局采取任何行动势必引起罢工的扩大,而无助于罢工的解决。”^③况且这次罢工并未波及洋人的轮船公司。因此,帝国主义未敢贸然镇压。

罢工至十三日,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徵五以私人身份进行调停。招商局坚持只与水手、火夫以及他们的老团体均安公所、焱盈社等单独接洽。海员与之针锋相对,提出必须与海员工会签约,否则一概无效。招商局最后采取强硬手段,登报向海员发出通告,片面宣布从七月一日起增加工资,限工人于一星期内上工,否则开除。工人置之不理,表示宁愿牺牲一切,

① 根据 1922 年 8 月《民国日报》材料统计。

②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 105 页。

③ 工部局总办处卷宗 2879 号(一)(1922 年)。

要将罢工坚持到底。

罢工的形势在继续发展,至八月二十三日,招商局参加罢工的船只已达二十四艘,其中泰顺、广利、新华、广大等四轮是航行于香港、广东一带,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加了工资的,这次也罢下来共同战斗。香港海员总会及汕头等地海员支部都来电表示声援。英国怡和公司的海员表示愿意将已加的薪水拿出来汇给上海海员作罢工费用,提督公司以及太平洋轮船公司麦留生总统号等粤籍海员也纷纷汇款接济。与此同时,招商局不断受到货主的压力,其所承运的各庄号纷纷去信催促其装货,罢工若再延续下去,各庄号就要向其他轮船公司订立装货合同。内外交困,形势日非,迫使招商局约海员工会谈判。在李徵五和粤商欧锦堂的调停下,林伟民代表海员工会和招商局总董李伟侯于八月二十五日达成协议:(一)工资增加二成。(二)自五月一日起加给。(三)罢工期内工资照给。(四)船员履行签字手续时需工会代表监视。(五)开除船员不当者,工会可提出纠正。历时二十一天的上海海员大罢工获得了全胜。

八月二十六日,工会召开全体大会,宣布谈判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工会带领海员到码头,中西乐队与鞭炮齐鸣,于新江天码头举行复工典礼。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上海罢工潮的最高潮。

与海员罢工的同时,闸北丝厂女工也发生罢工。

闸北一带是丝厂集中的地区,有协和、益记、绪昌仁、恒和、泰来等二十五家丝厂。丝厂女工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男工尤为惨重。缫丝女工整天围在电火之中,热锅之上,常常被炎热的蒸气熏得发痧昏倒。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每天要干十三小时的活。日夜辛劳,仅得工资三四角,还要受到资本家的扣押罚减,每月实得工资难以超过十元以上。^①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早已成为丝厂女工的呼声。由江苏省议员吴彝伯幕后操纵,丝厂女工穆志英(后成为工贼)等出面组织的女子工业进德会,在呈请淞沪警察厅立案时,因丝茧总公所反对,而没有得到批准,故对丝茧总公所深感不满。在罢工潮流的推动下,八月五日上午,女子工业进德会会长穆志英等率领一批女工,手执“男女平等”、“保障人权”等旗帜,到闸北一带游行,鼓动丝厂女工罢工。闸北二十五家丝厂女工见有人发动,立即起来反抗,纷纷参加罢工。女子工业进德会提出了:承认女子工业进德会;工作时间以十小时为限;冬天工资不得减少;每两星期休息一天等四项要求。第二天,罢工发展到虹口、胡家木桥、日晖港等地的丝厂,全市四十四家丝厂全部停工,有万余女工参加罢工^②。

丝茧总公所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当天即召集同业开紧急会议。决议六日停业一天,并将女工罢工情形通告各洋庄。此举是向工人示威,表示他们不怕工人罢工。会后,丝茧总公所总董还亲赴淞沪护军使署和淞沪警察厅,要求对工人严厉镇压。按照资本家的旨意,警察厅即于六日贴出布告:“如遇有手持白旗,挟迫各女工罢工者,立即拿送到厅,从重惩办。”并把女子工业进德会的招牌拿走。七日,四区警署又派警察进驻女子工业进德会,驱散了聚集在那里准备开会的二千多名女工。警厅和捕房还派出警察和巡捕驻守各丝厂,阻止工人罢工。租界内各丝厂部分女工于七日开始上工。午后,有大批女工自华界拥向租界的绪昌丝厂,打毁厂内玻璃窗等物,已经上工的女工再次罢工。接着又拥向旧白皮和纬云丝厂,劝导女工继续罢工。八日,四区警署将穆志英、王康侯等六人拘捕,解警厅司法科收押。穆志英立即向警厅俯首悔过。闸北大部分丝厂也于九日复工,罢工仅四天就完全失败了。

① 《民国日报》,1922.8.31。

② 《民国日报》,1922.8.7。

海员罢工的辉煌胜利与丝厂女工罢工的惨败,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其原因是因为海员罢工有党的影响和作用;在海员工会领导下,罢工是有组织、有策略地进行,因此罢工能获得胜利。而发动丝厂女工罢工的女子工业进德会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组织,其会章中明确规定“不得无故罢工妨害职业,不得吵闹车间,紊乱厂规”^①。显然是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只因丝厂资本家一时没有理解该会的用心良苦,反对它向警厅立案,女子工业进德会才迫不得已发动丝厂女工罢工。罢工之前,没有在女工中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光凭少数女工到各丝厂去摇旗呐喊,鼓动罢工。罢工以后也没有采取什么斗争措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省议员吴舜伯从南京到上海来调处。无组织的女工只好一味蛮干,甚至连续发生打厂事件,招致当局的严厉镇压。因此其惨败是必然的。

四、金银业罢工和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

金银业是中国最老的手工业之一,二十年代初,上海计有大小银楼三十四家之多,拥有两千余工人^②。金银业工人待遇差,生活苦,工资收入多者每月七、八元,少者只有二元,一般只有四、五元。为了维持生活,只能拼命干活,加班加点,一日工作有时超过十六小时。学徒年限很长,名义上规定为五年,实际上义务劳动六年后才能升为正式工。银楼公所是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机构,有大同行、新同行之分,大同行拥有银楼十八家,新同行十六家^③。但是,工人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帮助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成立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书记部上海分部负责人阮大时(后叛变),以及邵力子、高尚德(高君宇)、俞秀松、陈为人、王一知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演说^④。俱乐部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发动了十月的罢工。出面领导斗争的是俱乐部执行委员张静泉、吴忠法、庄向初等。张静泉即张人亚,一九二三年为上海地委第二党小组的党员^⑤。

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去函向银楼公所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增加薪资;(二)学徒年限减为三年;(三)星期日休息;(四)废除包工制;(五)改良待遇。银楼资本家不但不予理睬,反而乘中秋节期,无故将张静泉等三名委员开除。工人立即加提了两条:(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二)将开除的三名委员复职。连前总共七条,要各店主一律承认,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资本家置之不理。金银业工人遂于十月六日进行罢工。发表了罢工宣言。宣言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罢工是被逼迫的,俱乐部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必须誓死捍卫。并正式提出了九条,除了已经提的七条,又加了罢工期间不得扣除工资和开除新风祥德记银楼压迫工人的工头陆志香二条。

资本家立即进行反扑。罢工第二天,大同行银楼公所便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污蔑俱乐部是罢工机关,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又说同盟罢工是触犯刑章的,工人有什么要求,可派代表直接找银楼公所董事部商谈解决,对工人进行恫吓利诱,企图破坏工人团体。工人

① 《民国日报》,1922.8.7。

② 《民国日报》,1922.10.26。

③ 《民国日报》,1922年10月8、24日。

④ 《民国日报》,1922.9.17。

⑤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1982年9月28日。

团结一致，无所畏惧，并发表通告，驳斥了资本家的无耻烂言。之后，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罢工也不断扩大。十二日，祥和、九凤、永利、万兴等十余家银楼及银作工人相继加入罢工。十七日，又有专做洋金之姜发记、美和、美华利等数家加入罢工。

罢工第五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方椒伯出面进行调停，向双方斡旋。大同行方面特聘姜步七为交际代表。此人态度蛮横，声称对承认俱乐部这一条，没有讨论余地，惟增加工资可以磋商。针尖对麦芒，工人方面提出：如各店主不承认俱乐部，可不必磋议其他条件。新同行方面也于十月十五日，与工人代表谈判，同样坚执不愿承认俱乐部，只同意增加工资四成。谈判没有结果，南京路商界联合会调停中止。

激烈的斗争在继续着。十月十六日，大同行第二次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片面决定罢工期内工资照给，限三日内上工，如不上工，亦不派代表去磋商，则依法解约。工人非常气愤，纷纷向资本家提出质问。并郑重声明：“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是全体工人之代表”，不与俱乐部签订协议，坚决不上工。表示与其“受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①为对付资本家破坏罢工，俱乐部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每家银楼作场推代表两人，和俱乐部办事人员保持联系，选派纠察维持作场内的秩序，强调罢工要守纪律，若店主强迫工人上工，以和平方式抵制，坚决不上工。四川路复成银楼，单独承认了工人的条件，俱乐部区别对待，即通知该银楼工人先行复工。

罢工得到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广东、汉口、扬州、杭州、绍兴、镇江等地同业工人的支持，他们纷纷来函来电，鼓励罢工工人坚持到底，并愿给予经济援助。

资本家步步进逼。十八日，费文元、老凤祥等数家银楼勾结中西包探，强令工人上工。工人态度坚决，相率把行李搬出店堂。资本家便停止向工人提供膳宿。新同行银楼也片面决定加资四成，限工人于二十日一律上工。二十日上午俱乐部闻讯，即派出二十余工人至北浙江路庆华银楼劝阻工人上工，守卫在该银楼的印度巡捕乱捕工人。工人忍无可忍，即拥进庆华银楼，将门窗凳桌杯盘捣毁。捕房出动大批巡捕镇压，工人当场被打伤六、七人，被狼犬咬伤三、四人，被捕二十二人^②。二十二日，又拘捕工人二名。二十五日，在老北门穿心街合作银楼内将工人代表吴忠法捕去。前后被捕工人二十五人，一并解往公共租界汇司捕房拘押。淞沪警察厅以私设“秘密机关”，“要挟罢工”的罪名，于二十五日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取缔，并下令通缉俱乐部执行委员张静泉、庄向初。疯狂的镇压，给罢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徵五和方椒伯的重新调停下，于十一月二日，双方签订了协议七条。工人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如罢工期内工资照给，大同行工人工资四元以上加二成半，四元以下加四成，新同行一律加四成，日间包工制也被废除。但斗争的最主要目标承认俱乐部没有达到，被开除的三名执行委员也没有复职，工人还向庆华银楼点烛赔罪。十一月四日，工人全体复工。共计罢工二十八天，有二千余工人参加。

接着，又发生了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两厂万余工人，为保卫工会而举行的同盟罢工。起因是浦东纺织工会及其设立的义务学校，突于九月二十八日无故被三区警察署派警封闭，二百多名工人子弟被逐出校门。失去了工会的保护，资本家更是肆无忌惮地压迫工人，动辄扣罚工资，工人在厂中稍与别人接近，就说是给工会收会费，任意把工人开除。为此，上海各工团派出代表偕同纺织工会领导人张益章、王春鑫等三次向江苏省省长请愿，要求恢复浦东

① 《民国日报》，1922.10.17。

② 《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1、22日。

纺织工会，均遭拒绝。接着，又致函淞沪护军使提出同样要求。答复是“该会宗旨不明，碍难启封。”工人认为，工会被封，这是日本资本家唆使警署所为。所以纺织工会就致函日华纱厂大班，要求厂方转请警厅启封，限三日内答复，并发出了“如无赐复，倘工人有何举动，与敝会办事人一概无涉”^①的警告。连续二封去信，均被置之不理。于是全厂三千八百余工人于十一月一日愤而罢工。工人发表声明说：“工会是吾第二生命，如不达到启封目的，饿死也不上工。”^②次日，工会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向厂方提出七项条件：（一）启封纺织工会，实行第一次罢工签订之条约。（二）开除李（国土）、孙两翻译。（三）前次无故被开除的工人一律复职。（四）罢工期工资照发。（五）每月发红利二百两，津贴义务工人学校和施医所。（六）准许婴儿进厂哺乳。（七）不得扣除存工。

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③与浦东纺织工会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郭景仁（又名郭丹夫，后动摇脱党）去英美烟厂组织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时，几次筹备会都在纺织工会内召开。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俱乐部成立，郭景仁担任俱乐部书记。以后俱乐部的活动也常常在纺织工会内进行。纺织工会被封以后，烟厂工人担忧下一步的迫害将会累及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④。当日华纱厂十一月一日发生罢工的消息传到烟厂，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即于二日发动英美烟厂新老两厂九千七百余人支援日华纱厂的同盟罢工。俱乐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推选工人代表和厂方交涉，结合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向资本家提出了：启封纺织工会，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九项条件。表示不完全达到目的，誓死不上工。俱乐部还组织了一支三百名工人纠察队，来维持罢工秩序。

英国资本家的手段很狡猾，从十一月四日至九日，先后四次把工人代表请到该厂买办汪薇舟家进行谈判。第四次谈判时，英美烟公司董事部领袖英人娄斯，新老两厂大班海瑟和香脱海等都亲自出场。在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劳工有互助的义务，启封纺织工会问题是关键，这条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资本家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全部拒绝，连增加工资这一条，也只同意将工资水平最低的印花车间，每日工资从三角五分加到四角，包烟女工每千支加二厘五毫，其他一律不加。谈判未取得结果。

日本资本家的态度很强硬，罢工第二天即发出通告，以“近来花涨纱跌，纱厂景象衰败”为由^⑤，宣布关厂停工，通知工人到厂领取存工，以此威胁工人。并蛮横地声明：“对工人要求，极端否认。”^⑥吓得以往热衷于调停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不敢出任调停。上海一些工团也忙了一阵子，推出代表，企图进行调停。厂方未予理睬。

此时，军阀当局完全俯首听命于洋资本家。罢工一开始，淞沪护军使即指令警察厅将纺织工会领导人张益章等拘案严究。并出示布告，要工人照常上工，如不服从，即“以军法从事”。工人没有屈服，他们既不去上工，也不到厂里领取存工。罢工一久，工人生活上发生了困难，家住浦东的工人纷纷返回家乡，外地客籍女工，有的赴隆茂栈拣剔花衣，有的往别

① 《民国日报》，1922.10.31。

② 《民国日报》1922.11.4。

③ 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前身为烟草工会。烟草工会成立于1921年8月浦东英美烟厂罢工胜利后，会址设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内，1922年7月18日，书记部被封，烟草工会也自行消失。

④ 《访问郭丹夫谈话记录》；《民国日报》，1922.11.4。

⑤ 《民国日报》，1922.11.3。

⑥ 《民国日报》，1922.11.5。

处找工作，其余都静候在家，听从工会的号令，艰苦地坚持罢工。七日，烟厂工人在吴家厅集会，等候谈判消息，也被四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强行驱散。

倚仗军阀当局的武力支持，英美烟厂资本家于十三日发出通告，限工人于十五日上午八点钟之前上工，否则作自动解雇。三区警察署紧密配合，到时派出巡警在厂门口监视工人上工。但是，这不过是资本家的如意算盘，除少数工贼被收买，广大工人仍然斗志昂扬，全然不理资本家的最后通牒。该厂有一个名叫“工业进德会”的小工团，有会员三、四百人，其会长邵炳生甘心充当工贼，动员其会员复工。但是，工人都不听他的。

后来资本家派出走狗去各处，以重金招募新工人来代替原有工人。十七日，浦东有数十名俄、日两国工人应募。十八日，在浦西又招募了数百人，由流氓打手护送，渡江去烟厂上工，同时宣布开除一些工人。这激起了工人的愤怒，他们纷纷欲往厂内抵制。为避免冲突，招致当局的镇压，俱乐部引导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当天上午，四千余工人列队到三区警察署请愿。第二天下午又在浦东一带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呼吁商界罢市援助工人。二十日上午，资本家继续招募一百多名新工人入厂破坏罢工。工人怒火中烧，遂往厂门口与带领上工的工贼发生冲突。另有一批工人拥到资本家的忠实走狗、该厂买办汪薇舟家，捣毁了门窗家俱。并有五、六百工人围聚在三区警察署，要求拘办破坏罢工的工贼。淞沪警察厅忙从浦西调集大批武装军警前去镇压。二十三日，工人被迫复工，二百多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俱乐部也被迫停止活动。

在日华纱厂，三区警察署长于十一月十八日召集各部工头二十余人，在警察署与厂方代表商谈，完全按照厂方意旨，胁迫工头签订了四项协议：（一）罢工期间，每人贴补工资二天。（二）所有封存工会内器具什物，由房东呈请警厅启封，以便搬运出外。（三）各工人上工后，由各部工头联名呈请警厅，转呈护军使撤销张益章、郭陞山等通缉令。（四）纺织工会改组名称，修改章程，呈请官厅立案。这一违背工人利益的四项协议，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十九日下午，一千余工人在吴家厅开会集议，针锋相对地提出：启封纺织工会，取消通缉张益章，将巡官夏桂庭、翻译李国士调离该厂等六条要求。三区警察署派警强行驱散工人开会，工人受伤多人。一群怒不可遏的工人，跑到日本资本家的鹰犬李国士家里，捣毁了家俱什物。警察捕去工人二名。数百名工人即拥至三区警察署，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警察鸣枪驱散工人。当天下午五时，有三、四百名工人手执小旗，上书“要求新老两厂同胞工人援助，纷纷向烟厂一带游行示威，遭到大批武装军警的镇压。二十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先遭失败，日华纱厂工人失去了有力的同盟军，燃烧了二十五天的罢工烈火也被扑灭，积极斗争的四十八名工人被开除出厂。十一月二十六日，工人忍痛复工。

金银业罢工和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家不断总结和变换对付工人运动的手法，部分工人被资本家的毒辣手段所激怒，一连发生了打砸商店和资本家走狗住宅的事件，使反动当局找到了严厉镇压的借口。

在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工人同盟罢工的影响下，十一月六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六千余职工也发生罢工。向资本家提出了，承认上海烟草工会有永久代表工人之权，每月补助工会经费五百元，拨给工会会所，不得藉故开除罢工发起人，以及增加工资和罢工期间工资照给等十七项要求。罢工后，工人留在厂里，保持了良好秩序。

南洋烟草公司资本家善于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欺骗工人，并企图利用英美烟厂罢工的机会大捞一把。罢工第二天，经理即邀请工人代表谈判，一方面在经济上答应工人要求，但又要

求工人“加意勤力，于工人自身亦有间接之利益”^①，以此来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加紧对工人控制，表面上答应工人组织工会，暗地里勾结收买高级职员，把上海烟草工会改名为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使工会成为资本家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资本家答应工人条件后，罢工即告结束。

金银业罢工和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以后，上海的罢工潮就此低落。

五、上海第一次罢工潮的特点

一九二二年上海第一次罢工潮，这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显示自己力量的第一次大检阅，给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资产阶级以有力的抗击。这次罢工潮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组织工会和维护工会的基本权利是罢工斗争的焦点。罢工前大多按产业组织了工会，如浦东纺织工会、海员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和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等，只有邮务友谊会是在罢工发生后组织的。这些工会都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罢工是由工会出面去发动和领导的。工人向资本家提出的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撤换压迫工人的监工、星期天休息、取消不合理规定等种种条件中，核心的一条是要求承认工会（或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友之权。而资本家集中反对的也正是这一条，不仅不肯承认工会，而且竭力加以破坏；在罢工中，资本家往往撇开工会直接找工人对话，以此离间工人与工会的关系；即使有时在经济上被迫对工人让步，也以开除工会领袖为交换条件，还美其名曰“调工作”或“自动辞职”以进行欺骗；并要工会改组名称，修改章程；进而勾结官厅通缉逮捕工会领袖，直至封闭工会。工人为捍卫工会和维护工会基本权利进行坚决的斗争。日华纱厂连续三次罢工，后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资本家声明与纺织工会断绝关系和唆使官厅封闭纺织工会，英美烟厂也为声援纺织工会而同盟罢工。工人把工会当作他们的第二生命，声明一切听从工会的号召，不与工会签订协议，坚决不上工，表示与其“受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②这说明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中外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获得自身的解放，首先必须联合起来，拥有自己的组织，进行罢工斗争，锻炼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二）规模大，时间长。从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罢工至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其间十三个月，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③。而上海单是一九二二年就发生大小罢工五十四次，参加人数在八万五千以上，其中千人以上的罢工有十六次，八月份的闸北丝厂罢工和十一月份的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参加人数均在万人以上。这些罢工大多数取得了胜利^④。对比全国，论罢工的规模，上海是名列前茅的。罢工时间也很长，坚持二十天以上的有五次，最长的金银业罢工达二十八天，比一九二〇年的三至五天大有进展。罢工时间长，说明工人已组织起来，有了觉悟。因为罢工等于失业。恩格

① 《民国日报》，1922.11.9。

② 《民国日报》，1922.10.17。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22页。

④ 根据1922年《民国日报》记载统计。

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一段谈到罢工时说：“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滋味)的工人来说，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它，宁愿成年累月挨饿受苦而坚定不移，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很难想像，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自发罢工能坚持这么久。

(三) 罢工低落虽早，但起潮也早，持续期长。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水陆交通便利，易受外来影响。香港海员罢工刚掀起，二月份就有上海第二纱厂一千四百余工人和三新纱厂六千余工人的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更是鼓舞了上海的工人。四月份，日华纱厂和全市邮差首先进行有组织的罢工，且旗开得胜。接着罢工浪潮滚滚而来，并推动了上海附近城市苏州、无锡等地罢工运动的兴起。而北方铁路罢工潮以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为起点，矿山最早是九月十三日的安源煤矿罢工，武汉第一次是七月份的汉阳钢铁厂罢工。可见，上海罢工起潮要比其他地区早。八月份上海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上海罢工潮的高峰。十月份金银业罢工受挫，罢工呈低落之势。至十一月份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上海罢工运动首先低落。其他地区的罢工潮还是一浪接着一浪，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全国工运才转入低潮。上海罢工低落虽早，但是，罢工持续期却比全国任何地区长。即使以四月份的日华纱厂和全市邮差罢工作为上海罢工潮的起点，到十一月底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失败止，持续期为七个半月，其他地区持续最长的北方铁路罢工也只有五个半月(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可见，一九二二年上海第一次罢工潮，在全国罢工高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其对全国的影响来说，北方铁路罢工最大，南方海员罢工次之，上海可列第三位。过去有贬低上海工运的现象，例如《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七月)中曾说，“虽然这个城市(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工人运动。”^①其实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情况，并不符合一九二二年的实际。

上海罢工运动低落比其他地区早，主要是由于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统治势力异常强大；尤其是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积有对付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他们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也要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还美其名曰“调工作”或“自动辞职”，以进行欺骗^②。相对而言，上海工人阶级还很稚弱，在政治斗争舞台上还是一个新手。虽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敢打敢冲，但毕竟缺乏经验，还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也不懂得在斗争中组织和积蓄力量。因此，难免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受到挫折，还需要在以后长期的斗争中积累经验，增长力量，才能挫败这个凶恶的敌人。

(续完)

① 《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第1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35页。